



毛主席語錄 槍桿子裏面出政權

關於馬來亞統一問題的意見提綱

編者按：這是幾位同志向我黨提出的關於馬來亞統一問題的意見，我們刊出來，爲的是給黨內外同志作爲研究該重大路線問題的參考。

- (一) 我們對帝國主義的“分而治之”與“合而治之”兩套策略應有正確的認識。帝國主義不論是採取那一套，都是用來鎮壓人民革命，挽救自己的失敗與滅亡。
- (二) “分而治之”是爲了分化人民，使人民不能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在多民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分而治之”往往是爲了製造民族誤會、猜忌與對立。尖銳的階級矛盾轉化爲民族衝突，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就坐享漁人之利。（馬來亞歷史上的‘馬來屬邦’與‘海峽殖民地’的分治，星島與馬來亞半島的一再分治，都是殖民國主義“分而治之”政策的產物）。
- (三) 合而治之——當分而治之之再也不能保住自己的統治時（例如有些地區人民運動高漲，反動派的地位岌岌可危），帝國主義就不得不改變策略，用“合而治之”來把幾個發展不平衡的（包括經濟發展不平衡、人民革命力量的發展不平衡等）地區併湊在一起，把各地區的各種反動勢力湊在一起，共同鎮壓人民。
- (四) 在實行“合而治之”的反革命政策時，反動勢力企圖使自己統一起來，但是絕不讓人民的力量統一，對於人民，對於各民族，他們仍然要分化，要分而治之。換句話說，他們不讓人民享受統一的成果。如星島還沒有「脫離馬來西亞」時，「星洲公民」被視爲次等公民，馬來亞人民在星島與馬來亞半島之間來往都受限制，人民的政治活動與政治權利也受限制。總之，帝國主義與反動派所搞的“合而治之”，總是包括這兩方面：
 - 第一：聯合有關地區的反動勢力，共同鎮壓人民革命。
 - 第二：對人民、對各民族，仍然是實行分化。

列宁关于殖民地和民族问题的论述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為推翻資產階級的壓迫而鬥爭的自覺的代表者，它根據自己反對資產階級民主制和揭露其荒誕偽善的基本任務，在民族問題上也不應當提出抽象的和形式上的原則，而應當做到：第一、正確地估計具體的歷史情況，首先是經濟情況；第二、把被壓迫階級和被剝削勞動者的利益，同一般人民利益的普通概念明確地區分開來，因為這種概念意味着統治階級的利益；第三、把被壓迫的、非獨立的、沒有平等權利的民族同壓迫的、剝削的、享有充分權利的民族也明確區分開來，與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虛偽性對立起來，這種虛偽性蒙蔽着財政資本時代和帝國主義時代所特有的現象，即為數無幾的最富強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對世界絕大多數人民實行殖民地奴役和財政奴役。」

義和資本主義消滅以後，只有在落後國家的全部經濟生活基礎急劇改變以後才能消逝，那這些偏見的消逝，就不能不是很緩慢的，因此，各國有共產主義覺悟的無產階級對於受壓迫最久的國家和民族的民族感殘餘要特別尊重，特別注意，同時為了更快地消除以上所指出的不信任心理和偏見，必須作某種讓步。沒有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群眾自願追求聯盟和統一的願望，戰勝資本主義的這一事業是不能順利完成的。」

毛主席語錄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帝國主義制度走向全部崩潰的時代，帝國主義者業已陷入不可解脫的危機之中。

「一個國家愈是落後，這個國家的小農業生產、宗法制度和閉塞性就愈加厲害，而且這種情況必然使最深刻的小資產階級偏見，即民族利己主義和民族狹隘性特別頑固有力。既然這些偏見只有在各先進國內的帝國主

（接自第一版）

- (五) 由敵人安排的政治局面，不論是分治也好，合治也好，或美其名為「獨立」、「統一」、「合併」，要害的問題是一個「治」字，是敵人「治」我們。「分」也是敵人「治」我們，是敵人分別來「治」我們；「合」也是敵人「治」我們，是敵人聯手「治」我們。這是因為政權仍在敵人的手中，搞來搞去，我們仍是被「治」。如果把政權奪到人民手中，我們「治」敵人，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忘了這點，就是忘了根本，就是掉了腦袋。
- (六) 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採取「合治」也好，「分治」也好，總是考慮到有利於他們而不利於人民和革命的（暫時的有利與暫時的不利），總是從其反革命的願望出發的。如果某種安排有利於人民而不利於帝國主義與反動派，難道帝國主義與反動派願自己來做這種安排嗎？如果說某種安排對帝國主義、反動派與人民都有利，那豈不是說我們人民和帝國主義有「共同利益」嗎？毛主席教導我們：「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 (七) 關於星島與馬來亞半島建立革命聯系的問題。敵人的「分而治之」固然給我們建立這種聯系造成困難，但是，我們怎麼能指望通過敵人的安排以方便我們建立革命聯系呢？
- (八) 我們要實現馬來亞（包括星島）的真正的統一，就必須從反動派的手中把政權奪取過來。由人民當家做主，這樣的統一才能真正解除人民的痛苦，造福人民。（像越南的南北統一，也必定是越南南方完全解放了，由人民當了整個越南土地的主人，才能真正實現。）星島同胞不能接受、或不願意接受敵人安排下的「合併」、假統一，這反映了人民認識到政權的重要，知道政權問題才是要害問題。如果全馬來亞都由人民自己當家做主，人民是絕不會反對統一的，而且是迫切地要統一的。這說明人民在這個問題上的覺悟高，而不是覺悟低。

“共產黨人”發刊詞

(4-10-1939)

中央很早就計劃出版一個黨內的刊物，現在算是實現了。爲了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刊物是必要的。在當前的時機中，這種必要性更加明顯。當前時機中的特點，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中的投降危險、分裂危險和倒退危險日益發展着；又一方面，是我們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而黨的任務是動員群眾克服投降危險、分裂危險和倒退危險，並準備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使黨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遭受出乎意料的損失。在這種時機，這樣一個黨內刊物的出版，實在是十分必要的了。

這個黨內刊物定名為〔共產黨人〕。它的任務是什麼呢？它將寫些什麼東西呢？它和別的黨報有些什麼不同呢？

它的任務就是：幫助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爲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迫切地需要建設這樣一個黨，建設這樣一個黨的主觀客觀條件也已經大體具備，這件偉大的工程也正在進行之中。幫助進行這件偉大的工程，不是一般黨報所能勝利的，必須有專門的黨報，這就是〔共產黨人〕出版的原因。

在某種程度上說來，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全國性的黨，也已經是一個群眾性的黨；而且就其領導骨干說來，就其黨員的某些成份說來，就其總路綫說來，就其革命工作說來，也已經是一個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鞏固的和布爾什維克化的黨。

那末，現在提出新的任務的理由何在呢？

理由就在：我們現在有大批的新黨員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組織，這些新組織還不能說是廣大群眾性的，還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組織都鞏固的，還不是布爾什維克化的。同時，對於老黨員，也發生了提高水平的問題，對於老組織，也發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進一步鞏固和進一步布爾什維克化的問題。黨所處的環境，黨所負的任務，現在和過去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有很大的不同，現在的環境是複雜得多，現在的任務是艱巨得多了。

現在是民族統一戰綫的時期，我們同資產階級建立了統一戰綫；現在是抗日戰爭的時期，我們黨的武裝在前綫上配合友軍同敵人進行殘酷的戰爭；現在是

我們黨發展成爲全國性的大黨的時期，黨已經不是從前的樣子了。如果把這些情況聯繫起來看，就懂得我們提出“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是怎樣一個光榮而又嚴重的任務了。

我們現在要建設這樣一個黨，究竟應該怎樣進行呢？解決這個問題，是同我們黨的歷史，是同我們黨的十八年鬥爭史，不能分離的。

我們黨的歷史，從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那個時候起到現在，已經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中黨經歷了許多偉大的鬥爭。黨員、黨的干部、黨的組織，在這些偉大鬥爭中，鍛鍊了自己。他們經歷過偉大的革命勝利，也經歷過嚴重的革命失敗。同資產階級建立民族統一戰綫，又由於這種統一戰綫的破裂，同大資產階級及其同盟者進行過嚴重的武裝鬥爭。最近三年，則又處於同資產階級建立民族統一戰綫的時期中。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道路，是在這樣同中國資產階級的複雜關聯中走過的。這是一個歷史的特點，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過程中的特點，而爲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史中所沒有的。再則由於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半封建經濟佔優勢而又土地廣大的國家，這就不但規定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基本的革命的動力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而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還有民族資產階級的參加；並且規定了中國革命鬥爭的主要形式是武裝鬥爭。我們黨的歷史，可以說就是武裝鬥爭的歷史。斯大林同志說過：“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一）這是說得非常之對的。這一特點，這一半殖民地的中國的特點，也是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史中所有的，或是同那些國家不相同的。這樣：1.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建立或被追分裂革命的民族統一戰綫，2.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裝鬥爭，——就成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的兩個基本特點。這裏，我們沒有把黨同農民階級和黨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關係作爲基本特點，這是因爲：第一，這種關係，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原則上都是一樣的；第二，在中國，只要一提到

(轉入第四版)

(接自第三版)

武裝鬥爭，實質上即是農民戰爭，黨同農民戰爭的密切關係即是黨同農民的關係。

由于這兩個基本特點，恰是由于這些基本特點，我們黨的建設過程，我們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過程，就處在特殊的情況中。黨的失敗和勝利，黨的后退和前進，黨的縮小和擴大，黨的發展和鞏固，都不能不聯系于黨同資產階級的關係和黨同武裝鬥爭的關係。當我們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地處理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綫或被迫着分裂統一戰綫的問題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什維克化就前進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確地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係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什維克化就會要後退一步。同樣，當我們黨正確地處理革命武裝鬥爭問題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什維克化就前進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確地處理這個問題時，那麼，我們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什維克化也就會要後退一步。十八年來，黨的建設過程，是這樣同黨的政治路線密切地聯系着，是這樣同黨對于統一戰綫問題、武裝鬥爭問題之正確處理或不正確處理密切地聯系着的。這一論斷，很明顯地，已經被十八年黨的歷史所證明了。倒轉來說，黨更加布爾什維克化，黨就能、黨也才能更正確地處理黨的政治路線，更正確地處理關於統一戰綫問題。這一論斷，也是很明顯地被十八年來的黨的歷史所證明了。

所以，統一戰綫問題，武裝鬥爭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係，就等于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而在十八年黨的歷史中，憑借我們豐富的經驗，失敗和成功、後退和前進、縮小和發展的深刻的和豐富的經驗，我們已經能夠對這三個問題做出正確的結論來了。就是說，我們已經能夠正確地處理統一戰綫問題，又正確地處理武裝鬥爭問題，又正確地處理黨的建設問題。也就是說，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綫，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績。

在這里，讓我們對于這三個法寶，三個問題，分別地大略地說一下吧。

十八年中，中國無產階級同中國資產階級和其他階級的統一戰綫，是在三種不同的情況、三個不同的階段中間發展着的，這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的階段，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戰爭的階段和今天的抗日戰爭的階段。三個階段的歷史，證明了下列的規律：(一)由于中國最大的壓迫是民族的壓迫，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能夠參加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軍閥的鬥爭的。因此，無產階級在這種一定的時期內，應該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綫，並盡可能地保持之

(二)又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種歷史環境下，就會動搖變節。因此，中國革命統一戰綫的內容不能始終一致，而是要發生變化的。在某一時期有民族資產階級參加在內，而在另一時期則民族資產階級並不參加在內。(三)中國的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直接為帝國主義服務並為它們所蒙蔽的階級。因此，中國的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歷來都是革命的對象。但是，由于中國的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的各個集團是以不同的帝國主義為背景的，在各個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尖銳化的時候，在革命的鋒芒主要地是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時候，屬於別的帝國主義系統的大資產階級集團也可能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時期內參加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鬥爭。在這種一定的時期內，中國無產階級為了削弱敵人和加強自己的後備力量，可以同這樣的大資產階級集團建立可能的統一戰綫，並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條件下盡可能地保持之。(四)在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參加統一戰綫並和無產階級一道向共同敵人進行鬥爭的時候，它仍然是很反動的，它堅決地反對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發展，而要以限制，而要採取欺騙、誘惑、“溶解”和打擊等等破壞政策，並以這些政策作為它投降敵人和分裂統一戰綫的準備。(五)無產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者是農民。(六)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可靠的同盟者。這些規律的正確性，不但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時期證明了，而且在目前的抗日戰爭中也在證明着。因此，無產階級的政黨在同資產階級（尤其是大資產階級）組織統一戰綫的問題上，必須實行堅決的、嚴肅的兩條戰綫鬥爭。一方面，要反對忽視資產階級在一定時期中一定程度上參加革命鬥爭的可能性的錯誤。這種錯誤，把中國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看做一樣，因而忽視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綫並盡可能保持這個統一戰綫的政策，這就是“左”傾關門主義。另一方面，則要反對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綱領、政策、思想、實踐等等看做一樣的東西，忽視它們之間的原則差別的錯誤。這種錯誤，忽視資產階級（尤其是大資產階級）不但在極力影響小資產階級和農民，而且還在極力影響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力求消滅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力求把無產階級和共產黨變成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實歸于資產階級的一群一黨的事實；忽視資產階級（尤其是大資產階級）一到革命同他們一群一黨的私利相衝突時，他們就實行叛變革命的事實。如果忽視了這一方面，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過去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特點，就是引導無產階級適合資產階級一群一黨的私利，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主觀原因。中國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

(轉入第五版)

(接自第四版)

的這種二重性，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和黨的建設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鬥爭的政治路線。中國共產黨的黨的建設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鬥爭的中間發展起來和鍛鍊出來的。這里所謂聯合，就是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綫。所謂鬥爭，在同資產階級聯合時，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鬥爭；而在被迫着同資產階級分裂時，就轉變為武裝鬥爭。如果我們黨不知道在一定時期中同資產階級聯合，黨就不能前進，革命就不能發展；如果我們黨不知道在聯合資產階級時又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和平”鬥爭，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就會瓦解，革命就會失敗；又如果我們黨在被迫着同資產階級分裂時不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武裝鬥爭，同樣黨也會瓦解，革命也就會失敗。所有這些，都是在過去十八年的歷史中證明了的。

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戰爭。它的歷史，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參加北伐戰爭。這時，我們黨雖已開始懂得武裝鬥爭的重要性，但還沒有徹底了解其重要性，還沒有了解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第二階段，是土地革命戰爭。這時，我們黨已經建立了獨立的武裝隊伍，已經學會了獨立的戰爭藝術，已經建立了人民政權和根據地。我們黨已經能夠把武裝鬥爭這個主要鬥爭形式同其他許多的必要的鬥爭形式直接或間接地配合起來，就是說，把武裝鬥爭同工人的鬥爭，同農民的鬥爭（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婦女的、一切人民的鬥爭，同政權的鬥爭，同經濟戰綫上的鬥爭，等等鬥爭形式，在全國範圍內或者直接地或者間接地配合起來。而這種武裝鬥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土地革命鬥爭。第三個階段，就是現在的抗日戰爭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我們能夠運用過去第一階段中尤其是第二階段中的武裝鬥爭的經驗，能夠運用武裝鬥爭形式和其他各種必要的鬥爭形式互相配合的經驗。這種武裝鬥爭的總概念，在目前就是游擊戰爭^(二)。游擊戰爭是什麼呢？它就是在落後的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為了戰勝武裝的敵人、創造自己的陣地所必須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鬥爭形式。到目前為止，我們黨的政治路線和黨的建設，是密切地聯系于這一鬥爭形式的。離開了武裝鬥爭，離開了游擊戰爭，就不能了解我們的政治路線，也就不能了解我們的黨的建設。我們政治路線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裝鬥爭。十八年來，我們黨是逐步學會了並堅持了武裝鬥爭。我們懂得，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

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十八年來，我們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什維克化，是在革命戰爭中進行的，沒有武裝鬥爭，就不會有今天的共產黨。這個拿血換來的經驗，全黨同志都不要忘記。

黨的建設的過程，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什維克化的過程，也同樣是有三個階段的特點的。第一個階段是黨的幼年時期。在這個階段的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綫是正確的，黨員群眾和黨的干部的革命積極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獲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勝利。然而這時的黨終究還是幼年的黨，是在統一戰綫、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三個基本問題上都沒有經驗的黨，是對於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差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的黨。因此，黨的領導機關中佔統治地位的成份，在這一階段的末期，在這一階段的緊要關頭中，沒有能夠領導全黨鞏固革命的勝利，受了資產階級的欺騙，而使革命遭到失敗。在這一階段中，黨的組織是發展了，但是沒有鞏固，沒有能夠使黨員、黨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堅定起來。新黨員非常之多，但是沒有給予必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工作經驗也不少，但是不能夠很好地總結起來。黨內混入了大批的投機分子，但是沒有清洗出去。黨處於敵人和同盟者的陰謀詭計的包圍中，但是沒有警覺性。黨內湧出了很多的活動分子，但是沒有來得及造成黨的中堅骨幹。黨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裝，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這些情形，都是由于沒有經驗，缺乏深刻的革命認識，還不善于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這就是黨的建設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即土地革命戰爭的階段由于有了第一階段的經驗，由于對於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的進一步的了解，由于我們的干部更多地領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更多地學會了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我們黨就能夠進行了勝利的十年土地革命鬥爭。資產階級雖然叛變了，但是黨能夠緊緊地依靠着農民。黨的組織不但重新發展了，而且得到了鞏固。敵人雖然天天在暗害我們的黨，但是黨驅逐了暗害分子。大批干部重新在黨內湧出，而且變成了黨的中心骨幹。黨開辟了人民政權的道路，因此也就學會了治國安民的藝術。黨創造了堅強的武裝部隊，因此也就學會了戰爭的藝術。所有這些，都是黨的重大進步和重大成功。然而，一部分同志會在這個偉大鬥爭中跌下了或跌下過機會主義的泥坑，這仍然是因為他們不去虛心領會過去的經驗，對於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不了解，對於馬克

(轉入第六版)

(接自第五版)

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沒有統一的理解而來的。因此，黨的領導機關的一部分人，沒有能夠在這一整個階段中掌握住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黨和革命在一個時期遭受過李立三同志“左”傾機會主義的危害，而在另一個時期，又遭受過革命戰爭中的“左”傾機會主義和白區工作中的“左”傾機會主義的危害。只在到了遵義會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後，黨才徹底地走上了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後來戰勝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這就是黨的發展過程的第二個階段。黨的發展過程的第三個階段，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階段。這個階段，已經過去了三年，這三年的鬥爭，是有非常偉大的意義的。黨憑借着過去兩個革命階段中的經驗，憑借着黨的組織力量和武裝力量，憑借着黨在全國人民中間的很高的政治信仰，憑借着黨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統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且進行了偉大的抗日戰爭。黨的組織已經從狹小的圈子中走了出來，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黨的武裝力量也在同日寇的鬥爭中重新壯大起來和進一步堅強起來了。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影響，更加擴大了。這些都是偉大的成功。然而，大批的新黨員還沒有受到教育，很多的新組織還沒有鞏固，他們同老黨員和老組織之間，還存在着很大的區別。大批的新黨員、新幹部還沒有足夠的革命經驗。他們對於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還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他們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完全的統一的理解，還相距很遠。在過去發展黨的組織的工作中，雖然中央着重地提出了“大胆發展而又不讓一個壞分子侵入”的口號，但實際上是混進了許多投機分子和敵人的暗害分子。統一戰線雖然建立了並堅持了三年之久，可是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却時時刻刻在企圖破壞我們的黨，資產階級投降派和頑固派所指揮的嚴重的磨擦鬥爭在全國進行着，反共之聲喧囂不已。大資產階級投降派和頑固派，並想以此作為投降日本帝國主義、分裂統一戰線和拉了

中國向後倒退的準備。大資產階級在思想企圖“溶解”共產主義，在政治上、組織上企圖取消共產黨，取消邊區，取消黨的武裝力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任務，無疑是克服這種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險，盡可能地保持民族統一戰線，保持國共合作，而爭取繼續抗日、繼續團結和繼續進步；同時，準備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使黨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遭受意外的損失。為達此目的，就要鞏固黨的組織，鞏固黨的武裝力量，並動員全國人民，進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堅決的鬥爭。這種任務的完成，依靠全黨的努力，依靠全體黨員、黨的幹部、黨的各地各級組織實行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鬥爭。我們相信，有了十八年經驗的中國共產黨，在它的有經的老黨員、老干部和帶着新鮮血波富有朝氣的新黨員、新幹部相互協力的情況下，在它的經歷過風浪的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和地方組織相互協力的情況下，在它的堅強的武裝力量和進步的人民群眾相互協力的情況下，是可能達到這些目的的。

這就是我們黨在十八年頭中的主要的經歷和主要的問題。

十八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這個個武器以實行對敵衝鋒陷陣的英勇戰士。這就是三者的相互關係。

我們今天怎樣建設我們的黨？要怎樣才能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這個問題，考察一下我們黨的歷史，就會懂得，把黨的建設問題同統一戰線問題，同武裝鬥爭問題聯繫起來看一下，把黨的建設問題同聯合資產階級又同它作鬥爭的問題、同八路軍新四軍堅持抗日游擊戰爭和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問題聯繫起來看一下，就會懂得。

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經驗和當前的新鮮經驗傳達到全黨，使黨鐵一樣地鞏固起來，而避免歷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注 釋

(一)引自斯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二)毛澤東同志在這里說中國革命的武裝鬥爭的總概念，就是游擊戰爭，是總結了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至抗日戰爭初期的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長時間內，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鬥爭都是游擊戰爭。這個時期的後一階段，隨着紅軍力量的成長，游擊戰曾經轉變為帶游擊性的運動戰（這種運動戰，按照毛澤東同志的規定，是提高了的游擊戰爭）。但在抗日戰爭期間，根據敵情的變化，這種帶游擊性的運動戰又轉變為游擊戰爭。在抗日戰爭的初期，黨內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同志輕視黨所領導的游擊戰爭，而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國民黨軍隊的作戰。毛澤東同志曾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和“戰爭和戰略問題”等著作中，駁斥了那種觀點，

(轉入第六版)

我黨爲越南人民的偉大領袖胡志明主席逝世

致越南勞動黨中央的唁電

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爲越南人民偉大領袖胡志明主席的逝世，於九月七日致河內越南民主共和國勞動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唁電。唁電全文如下：

河內

越南民主共和國勞動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我們深切哀悼胡志明主席的逝世，以表達我們內心無比的沉痛。

你們的損失就是我們的損失！

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

新加坡人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一九六九年九月七日

（接自第七版）

並在本文中把長時期內中國革命的武裝鬥爭採取游擊戰爭形式的經驗，作了理論上的總結。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鬥爭，到了抗日戰爭的後期，特別是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由於革命力量的新成長和敵情的新變化，戰爭的主要形式就由游擊戰爭轉變爲正規戰爭；而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後期，更發展爲使用大量重武器並包括攻堅戰的大兵團作戰了。

（三）一九三〇年九月舉行的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以及其後一時期的黨中央，對於停止立三路線作了許多有積極作用的措施。但在六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內一部分沒有實際革命鬥爭經驗的同志，以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二同志爲首，却起來反抗中的措施。他們在當時發表的名爲“兩條路線”又名爲“爲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中，特別強調地宣稱當時黨內主要的危險不是“左”傾機會主義，而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把“批評”立三路線的“右”當作其活動的資本。他們提出了一個在新的形態下，繼續、恢復或發展立三路線及其他“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的新的政治綱領，而與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相對立。這個新的“左”傾錯誤路線在黨內的統治，是從一九三一年一月間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集的政治局會議結束這一錯誤路線的領導而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中央的新領導時爲止。這次“左”傾錯誤路線在黨內統治的時間特別長久（四年），給予黨和革命的損失特別重大，其惡果，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紅軍的根據地都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使數千萬革命根據地的人民受了國民黨的摧殘，推遲了中國革命的進展。犯過這個“左”傾路線錯誤的同志，在長期體驗中，絕大多數都已經認識了和改正了自已的錯誤，並且做了許多有益于黨和人民的工作。這些同志和其他廣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認識的基礎上，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互相團結起來了。一九四五年四月間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於這個錯誤路線的各方面，作了詳細的總結。這個決議載“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政面子槍
機出程桿

兩股烽火燒馬來西亞

馬來半島和北加里曼丹地區內，兩股武裝鬥爭的烽火正在熊熊地燃燒。“馬來西亞”這個新殖民主義產物必將被這兩股烽火燒垮。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英國殖民軍對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對抗日戰爭有功的游擊隊突襲，並大捕反帝反殖民主義的進步人士。從那時起，馬來亞共產黨領導馬來亞各族人民，實行以革命的暴力反擊反革命的暴力。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馬共領導的人民武裝部隊正式命名為馬來亞民族解放軍。他們在馬來半島北部的霹靂州、吉蘭丹州、玻璃市州及馬泰邊境的廣大森林地帶，曾和三萬多英國殖民軍及十萬以上的馬來亞殖民警察激戰多年。

在長期武裝鬥爭的沉重打擊下，英帝國主義在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從根本上動搖了。它不得不再改變統治方式，甚至勾結美帝炮製出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的工具“馬來西亞聯邦”和“新加坡共和國”。但是，由英帝、美帝扶植起來的傀儡政權，一直在搖搖欲墜的狀態中。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爲了要維持其搖搖欲墜的統治權，竟從今年“5.13”以來發動民族大屠殺實行赤裸裸的法西斯軍事統治。馬共中央一方面領導解放軍在馬來亞北部加強打擊敵人，一方面於六月三十日發表一項聲明，號召馬來亞各族人民團結起來，用革命的暴力來抗擊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的大屠殺；號召馬來亞各族人民參加解放軍，打倒英帝、美帝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打倒拉赫曼——拉扎克傀儡政權，打倒李光耀傀儡政權，建立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人民共和國。拉赫曼驚慌失措，目前正在親自赴各州活動，搞什麼各族“親善委員會”的把戲，妄圖作垂死的掙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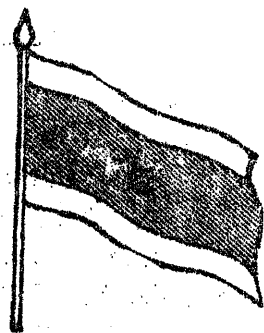
北加里曼丹中的沙撈越和沙巴兩部份，被英帝強行併入了“馬來西亞”。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領導的人民武裝，近七年來一直在和英帝及其傀儡拉赫曼政權進行武裝鬥爭。他們在北加里曼丹和印尼邊境的山林地帶，在沙撈越的叢林地帶，經常展開機動

靈活的游擊戰，有時突襲反動警察局，有時伏擊反動軍隊的巡邏隊，有時憑借有利的地勢痛殲來犯的軍警，陸續繳獲了敵人的武器，壯大了自己的力量。從一九六五年以後，這支人民武裝曾多次粉碎了“馬來西亞”拉赫曼政權和印尼蘇哈托政權勾結發動的“聯合圍剿”。這充分說明了他們經得起考驗，具有英勇頑強的戰鬥力量。

最近，北加里曼丹人民武裝在沙撈越第二省和第三省境內特別活躍。他們大力宣傳和組織群眾，揭露“馬來西亞”傀儡政權殘暴鎮壓各族人民的罪行。反動當局已被迫在第二省一些地區實行“戒嚴”。

英帝把北加里曼丹的汶萊長期置於“保護國”的地位，把沙撈越和沙巴交給拉赫曼傀儡政權管轄。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的奮鬥目標，是要把被分割後的汶萊、沙撈越和沙巴恢復統一，建起獨立的國家。他們堅信一定能夠用槍杆子打出一個統一獨立國家的革命政權（軍旗中間橫幅為紅色，上下白色，黃星）。

頭南畫



馬來亞民族解放軍軍旗

各民族人民團結起來，

用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

粉碎敵人的民族屠殺政策！